本版编辑：李少军
E-mail：t6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6049

书海泛舟

学与仕 学与思 学与行

□ 凌龙华

也许，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说法过于浪漫主义，但《论语》给我们的启示却历久弥新。一个“儒”字点击了“立人之所需”，而一个“学”字则点明了“立人之所由”。

学与仕

“仕，事也。”儒家看来，人生当有为，有为当“天下为公”。因此，学成而不出仕、不为国家做事是可耻的，至少是不可取的。

“仕，学也。”学为“仕”之本义，也是仕子安身立命之本业。因此，《论语》深情寄语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

“学与仕”从来都是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“学而优”——学有余力、学有所成，则义不容辞、当仁不让，出来做事做官，施展抱负。“仕而优”——处事游刃有余、公务尚有余暇，则少点应酬多些回归，勿忘读书，赶快“充电”吧。

一意两言，实质是两翼而一体。由此不难理解，四处碰壁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的孔子，何以会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无论落魄还是得宠，孔子总释放正能量。或给出坦荡的为政之要，“在其位，谋其政；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；或给出中肯的处世之道，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”。（危，正直；孙，通“逊”。）

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”中国文人的风骨，表面看有“儒”“道”两相，实质上都是儒家精神浸渐——从“格物致知诚意正心”到“修身齐家平天下”，哪一项不是在物我、进退间寻找寄托？

学与仕不冲突，事与政都归结于行，归结于以身作则——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
做官与做学问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还是做人。孔子谆谆告诫弟子：“女（汝）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——你们要做高尚的读书人，不要做低俗的小人。君子与小人的概念，在儒学体系中，俨然是理想、信仰与人生价值观的考量。两者对比性的论述，《论语》二十篇中比比皆是。为人处世——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”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；治邦理政——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”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。孔子为谦谦君子，《论语》给人最大的感受乃“如坐春风”。但这不表明孔子“好好先生”一个，须知，儒家是有原则的，有担当的，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近乎骂人，应当听取：“乡愿，德之贼也。”

君子自信更自省。孔门弟子曾子有“三省”之问（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），孔子有“四不”之忧（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”）。心存敬畏，能不忧而优乎？

——学为“仕”业，干部当“读好书”。

学与思

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学与思的辩证关系，《论语》一言蔽之，一语中的。后继儒家荀子借《劝学》加以演绎，遂成传世名篇。

学子大凡都有“学”之宏愿，也有寒窗苦读功夫。但学而不思、学而不化，着实可惜。这样的学，充其量学成“寻章摘句老雕虫”。不思则迷惘，心中乱网一张，管用吗？当然，思的前提还是要学，否则空中楼阁，无济于事。学是吸收，多多益善；思是升华，不可或缺。

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翻阅《论语》，我总为孔门师徒的精诚所感召。孔子自我评价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评价门生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由此，对韩愈《师说》中“是故圣益圣，愚益愚”的推断不免更认可。

现代生活，步履匆匆。“没有时间读书”几乎成了某些从政者的口头禅。信息化时代，阅读的快餐化、碎片化，又使得“学与思”割裂。不读原著，不读全本，不愿阅读，不深阅读，让我们的思想变成“为无源头活水来”的碎萍一池。

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，这是激发学习的热情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这是推崇学习的意义。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，这是追问学习的本质与目的。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”，这是点拨学习的方略与路径。

“道听而途说，德之弃也。”孔子聪明，更开明。或许周游列国时那次“眼见为虚”（错怪弟子做饭先偷尝）的教训让老人家心有戚戚。因而，他要搞个备忘录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”“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”。

“知（智）者不惑”。由学而思，由思而行，儒家的智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反思。于是有了“四绝”之戒与“九思”之勉。“四绝”为“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（大意为不凭空臆断，不绝对肯定，不固执一面，不自以为是）。“九思”为全方位系统思维：“视思明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听思聪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”。能如是，当为“君子”；否则，难去“小人”之虞？

学生根，思开花。有意思的是，孔子的嫡孙字“子思”，一代“述圣”，承上启下，发扬光大。子思所作《中庸》，微言大义，要言不烦。中有一言，直证知行逻辑链，经典——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。

——思为“学”业，领跑者当“读破”书。

学与行

儒家追求精神不朽，旨在“立业而立人”。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”通读《论语》，处处可见“三立”踪影。

“立”的前提是“学”，学的提升是“思”，思的跃迁是“行”，行的反哺是“知”。这一学理到了明代大儒王阳明那里，就凝聚成四字真谛“知行合一”。

孔子谨严慎独。他把批判与创造都融注在言传身教中。你看他“述而不作”，却一句话顶一万句，留下了《论语》这座取之不禁、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。

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。知识有用论，知识未必改变命运说，如此悖论，在孔子看来却是天经地义。他老人家甚至发狠话，实在读不进书，学学下棋也是有益的事。下面这段话，仿佛是教导“小孩子”的，苦口婆心，语不重却心甚长——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
孔子博闻强识，但绝不死学，绝不“学而不思”，要诀在于“一以贯之”——提升一个层面，以“道”贯“学”。这一思想，到孟子处，进一步发挥，翻转成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，高超！

学以致道。孔门子弟多能推己及人，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的大襟怀开创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的仁爱大境界。

学以济世。《论语》一开篇，孔子就热情洋溢地宣告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”而后，循循善诱，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，既给出忠告，“君子讷于言，而敏于行”，又指点修炼法式，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。

学而不能致用，学而无益人生，枉学也。试看，“子曰：‘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’”不满之意，溢于言表。

特别要提的是，《论语》一书中，“三思而后行”一则，耐人寻味。原文如是：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‘再，斯可矣。’”季文子为鲁国大夫，其人以行为圆熟“三思而后行”为时人称道。对此，一代圣人孔子何以会不识时务、空前发难？

“事有贵于刚决，多思转多私。”也许，孔圣人的这句话隐约给出注解。“三思”，多思也，深思熟虑，一般说来，不嫌多。当下许多“一把手工程”多缘“率性而为”致后患无穷。但，思行有节奏，凡事因人因时因机而有异。季文子这人的特点就是老于世故，偏藏私心，患得患失，犹豫不决。错失良机，不该问责？难怪孔圣人要半开玩笑地提醒：“想两想就够了！”这是怎样的幽默与睿智啊！

什么叫审时度势，什么叫与时俱进，什么叫原则性与灵活性，什么叫因地制宜、因材施教……担当与创新，从来需要文化自觉。

——行为“政”业，为官当有为。



用典释义

履不必同，期于适足；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。

【讲话原文】

“履不必同，期于适足；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。”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。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，才是最有生命力的。

——习近平《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——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》（2015年10月21日）

“履不必同，期于适足；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。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，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，人民政协就是适合中国国情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。

——习近平《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》（2014年9月21日）

【出处】

天下事，人情所不便者，变可复；人情所群便者，变则不可复。江河百源，一趋于海，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，得乎？履不必同，期于适足；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。

——（清）魏源《默觚下·治篇五》

【解读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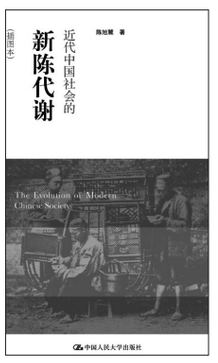
《默觚》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的哲学著作，“默”取魏源的字“默深”，觚为古代木简。该书著于清道光十五至十九年（1835—1839年），分《学篇》和《治篇》两大部分，编入魏源的《古微堂内集》。

《默觚》体现了魏源“变易”的今文经学思想。他从历史自身的“自变性”去探求历史发展的驱动力，主张“天下事，人情所不便者，变可复；人情所群便者，变则不可复”。认为历史变化发展的标准为“便民”——只要有利于人民就行了。为此，他用生动的比喻加以说明：“履不必同，期于适足；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。”意思是说，每一个人的鞋子大小不必相同，关键是要适合自己的脚；每个国家的治理方法不必雷同，关键是要有利于人民。

习近平主席两次在讲话中引用了魏源的这句话，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、独特的历史命运、独特的国情，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是历史的选择、人民的选择、时代的选择。

（杨立新）

好书推荐



书名：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（精装本）

作者：陈旭麓

出版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

推荐理由：作者认为，“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，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，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”。新旧杂陈，新陈代谢，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特点，也是其复杂性所在。在本书中，作者对近代中国的重要命题，进行了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辨析，发人深省。分析精当，文笔生动。通过本书，读者可以更加真切而深入地感受近代中国的历史脉动，进而增进对这段屈辱与奋斗的认知度。



书名：《大数据领导干部读本》

作者：本书编写组

出版：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

推荐理由：本书从领导干部的视角出发，紧扣“运用大数据提升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”这一主线，以国家大数据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为背景，以丰富的实践案例呈现了大数据在政府治理、经济治理、社会治理等方面引发的巨大变革，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诸多启示。

本书研究和写作团队包含了国家行政学院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和相关智库机构的专家，内容权威。“BAT三巨头”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，作为国内乃至全球三家顶尖大数据企业的掌门人，首次联袂担纲本书专家顾问。全书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、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分别撰写序言。

编者按：**当前，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这场“大考”，广大领导干部应怎样恪守为官之本，自觉践行“三严三实”要求？本文是学习习近平同志《为官一场 造福一方》一文的体会。**

怎样恪守为官之本

□ 戴 勇

《摆脱贫困》一书中有篇重要文章——《为官一场 造福一方》，这篇文章文风朴实、观点鲜明、语言简洁、说理透彻。这是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。1990年3月，习近平在《从政杂谈》一文中再次指出：“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，造福一方。”认真研读这篇文章，的确能给领导干部在恪守为官之本方面许多启示。

扛起领导干部的责任

在文章开头，习近平开宗明义地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进行了定位：“领导者的责任，主要是解决‘桥’和‘路’的问题。”

什么是“桥”？习近平指出，“‘桥’，即搭桥，为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渠道，架设桥梁”。他讲，当时宁德地区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出现了偏差，影响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治、整、改”方针的贯彻落实。如何让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大潮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因此，习近平在这里讲的“桥”，更深的含义是架设中央决策与基层落实的“连心桥”。走马上任地委书记后，习近平用时1个月走遍所辖9个县及毗邻的浙南温州、苍南等地，提出了“唱山歌”“念海经”“架连心桥”等重要思想。通过采取现场办公、群众接待日、挂钩联系点等具体措施，引导群众“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三中全会精神”，从而形成思想认同、行动跟进的良好局面，推动了经济健康稳定发展。

怎样铺“路”？习近平说，就是“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，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、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”，探索走出一条符合闽东经济发展的路子。为摆脱闽东贫困现状，他提出要发挥沿海优势，组织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；要遵循“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、注重效益”的指导思想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的“六个关系”；要着眼解决产业结构“三个难以”的问题，制定实施“五个立足点”的产业政策，等等。这些实践生动诠释了习近平对“路”的深邃理解。

应当说，解决“桥”和“路”的问题，是习近平长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问题。在宁德，他提出搭“连心桥”、走富裕路；在浙江，他提出实施“八八战略”、建设“平安浙江”；担任党的总书记后，他提出架设亚欧大陆友谊合作之桥、实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等，这些充分体现了他真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。

崇尚行动至上的精神

习近平特别强调：“我不主张多提口号，提倡行动至上。”这个思想在他的《摆脱贫困》《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》《之江新语》三部著作中多次体现，比如，“我是崇尚行动的。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”，“行动最有说服力”，“所有成就都是干出来的”，等等。

习近平说，行动至上就是要“既看准又干对”。任宁德地委书记时，他吸取过去见效不大的扶贫教训，采取全社会齐抓共管、兴办经济实体等综合措施，使全区脱贫率达87.3%。在调研闽东经济发展时，他从群众“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，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”的话语中，悟出了一个道理：“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山，兴旺在于林”，“森林就是水库、钱库、粮库”。他带领大家制定林业振兴七年规划，推动林业“五大基地”建设，实现了以林为业、振兴闽东的发展目标。

习近平还说：“我反对田园牧歌式的情调和人浮于事、松垮散漫的习气，提倡满负荷和紧张高效的工作节奏，今日事今日毕。”主政福州期间，他推行“特事特办、马上就办”，曾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，当场拍板、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；到任浙江后，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；履新上海一个月，就围绕民生、发展、上海世博会、反腐等工作，马不停蹄开展调研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真抓实干、紧张快干的工作作风和务实精神。

他还重点强调，行动至上就是要“敢为天下先，敢于冒一定的风险，不吃别人嚼过的馍”。在闽浙工作期间，他先后提出了建设“数字福建”“生态福建”“平安浙江”“法治浙江”“绿色浙江”“信用浙江”等一系列创新理念。实践中，他率先倡导推行机关效能建设，创新利用民资、引进外资以及强化社会管理等举措，展现了其鲜明的开拓进取风格。就任党的总书记后，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提出了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。

“为政贵在行。”从宁德的“行动至上”，到浙江的“干在实处”，再到现在的“实干兴邦”，习近平一脉相承的实践观，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传承。

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行

习近平强调“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，就是服务”。工作实践中，他始终“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”，带头“四下基层”，推行“马上就办”，树立“五种崇高情感”，倡导“跟着群众跳火坑”。任延安梁家河大队书记时，带领村民修筑淤地坝、成立铁业社、修建沼气池，还把北京奖励给先进知青的一辆三轮摩托车，换成了村民用得上的手扶拖拉机、磨面机和抽水机。在宁德，他拿着柴刀砍去挡在路面的荆棘，徒步10多公里“三进下党乡”，进行现场办公、解决难题。

习近平引用苏轼的话“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，强调“这是对党政干部的起码要求”。他不仅带头严于律己，还告诫亲朋好友遵守“两个不能”原则，“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”。抓廉政建设他也从不手软，在宁德，坚决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，主政浙江，坚决整治领导干部“收钱送钱、跑官要官、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谋利”等歪风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力正风肃纪、铁腕惩治腐败，坚持“老虎”“苍蝇”一起打，坚持不定指标上不封顶，持续保持“零容忍”的高压态势，显示了他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意志决心和非凡胆魄。

他还说，“单是廉政还不够，还要有政绩，要能改变当地面貌”。在宁德，他大念“山海经”；在福建，他强力推行“福州3820工程”；在浙江，他大力实施“八八战略”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。

《为官一场 造福一方》这篇重要文章启示我们，党员领导干部为官从政，责任是核心，体现宗旨意识；行动是根本，体现使命担当；清廉是保证，体现政治本色。三者相互联系、密不可分，科学回答了为谁当官、怎么当官、当什么官等根本性问题。

学思录